

高出生性别比及其婚姻后果

李 南

【提要】 出生性别比显著升高及其将要引出的后果,早已为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本文选用最近数据资料,对高出生性别比及其带来的“初婚市场失衡”、“无男孩负担比”等问题作了定量分析,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对实际工作部门有参考意义。

【作者】 李南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图杰普卡(S. Tuljapurkar)斯坦福大学莫瑞森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教授;费尔德曼(M. Feldman)斯坦福大学莫瑞森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教授。

近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活产男女婴之比,通常以女婴为100)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伴随着近15年来的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这种性别失衡将产生显著的人口学后果。本文对这些后果的第一个定量估计是从2010年开始,将出现初婚市场失衡,每年有近百万“额外”未婚男性没有初婚对象,此数约为男性年初婚人数的9%。即使发生初婚模式的显著变化,这种“额外”未婚男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比例上也是难以为变化了的初婚模式所容纳的。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是由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所驱动的,而产生和维持这种偏好的部分原因,在于男孩养老的传统。这也反映于中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对无男孩家庭特别重视。然而,目前的出生性别比虽然可以认为已经高得异常而且将产生显著的婚姻后果,但对社会的无男孩负担比(无男孩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下降贡献微弱;而且,从微观角度来看,一对夫妇有至少一个男孩的概率的上升也只产生微弱影响。如果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是由显著提高这一概率的愿望所驱动的,那么,目前的出生性别比与这种愿望的满足尚相差

甚远,因而其继续上升将是非常可能的。

在中国近期的人口学现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1]和出生性别比(SRB)的显著上升。历史地看,人类的SRB接近于105,随着各种因素的不同(如胎次等)而有微小变化^[2]。中国近期的SR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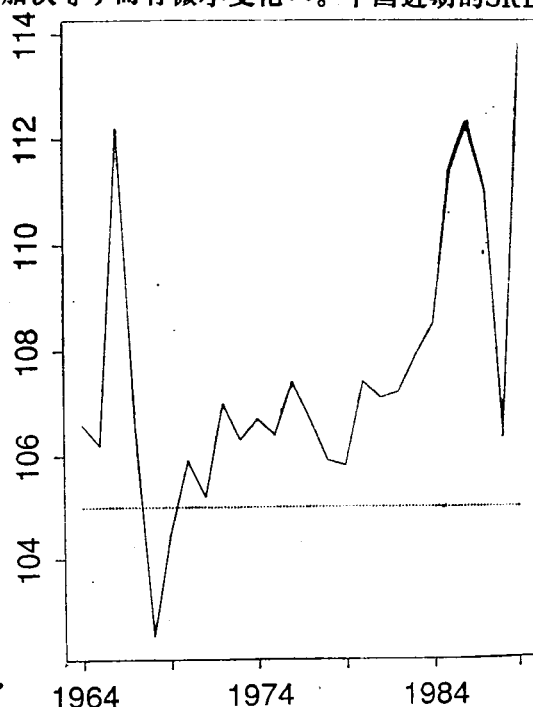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1964~1984年总出生性别比
(图中虚线为均值)

上升已明显超出了这一范围(见图1)。

本文着重讨论中国SRB上升的三种人口学后果。第一,初婚市场失衡的时间与规模;第二,当前的高SRB对于一对夫妇有至少一个男孩的概率的影响;第三,SRB对于无男孩负担比(NSDR)的影响。

一、婚姻

婚姻受许多因素影响,我们研究潜在配偶的供给。它由SRB、按龄死亡率和生育率决定。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度量潜在婚姻市场的两性别相对规模差异。

1.潜在婚姻比 R_T ,定义为男性法定最低结婚年龄($a+b$ 岁)以上人数比女性法定最低结婚年龄(a 岁)以上人数。

2.潜在初婚比 R_F ,定义为以男性按龄初婚频率加权的男性人数比以女性按龄初婚频率加权的女性人数;而某年某性别 n 岁初婚频率的值为该年该性别 n 岁初婚人数比该年该性别 n 岁人数^[3]。

中国的较早结婚和几乎所有人都结婚的婚姻模式,使得 R_F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结婚使得它与绝大多数人有关,不象 R_T 中包含了可能的再婚,而这种状态只与部分或少部分人有关。较早结婚又使得靠近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的年轻人口在 R_F 中具有较大权重,而不象在 R_T 中各年龄的人口具有同样权重,这又使得 R_F 与 R_T 很不相同。在本文的计算中,起始点为1990年普查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按龄初婚频率均为1990或1989年数值且均保持不变。老年死亡率的变化或男、女性按龄死亡率的变化不会对我们的结论产生定性的影响。而生育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在近期是不会发生很大变化的^[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生育率的变化不影响SRB的话,定性地我们的结论是不受生育率变化影响的。计算中分胎次SRB假定为1990年数值,就近期的趋势来看这是一种保守的假定。即使SRB下降,本文所描述的

现象在从2010年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也仍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上述假定下, R_F 与 R_T 的变化见图2。从1990年开始, R_F 与 R_T 均上升,在大约2000年达到第一个峰值,然后下降,在大约2005年达到谷底。在此之后,它们均表现为带有一定波动的持续上升。其中第一个峰值是由近期的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一般来说,由于丈夫年龄大于妻子,所以男性结婚对于女性而言属于出生较早因而人数较多的出生集团,这就造成了 R_F 与 R_T 的上升;当生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并保持稳定后,随着上述生育率下降作为促使 R_F 与 R_T 上升的动力消失,于是产生了 R_F 与 R_T 从2000年到2005年的下降。然而,在2005年左右,“历史上的”或从80年代末出现的高SRB将在 R_F 与 R_T 的变化中起主导作用。从2010年开始,近期的高SRB将推动 R_F 与 R_T 持续上升。如果从1990年开始,SRB按近期的趋势进一步上升而不是维持在1990年的数值,则 R_F 与 R_T 的上升将高于图3所描述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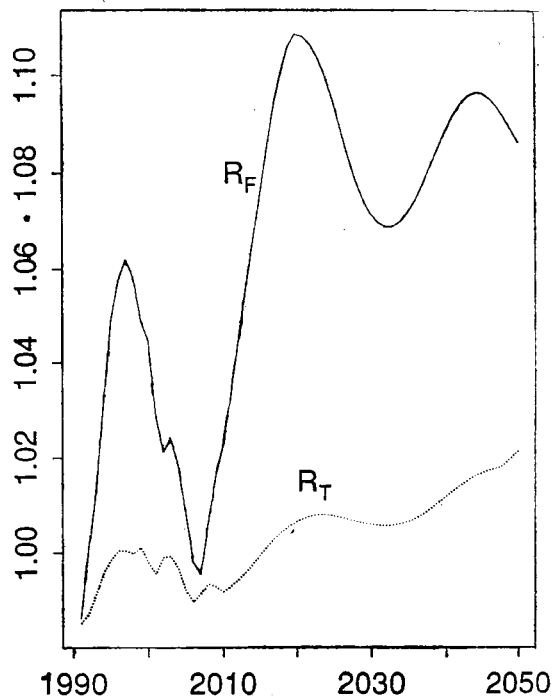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1990~2050年潜在初婚比(R_F)与潜在婚姻比 R_T

对于包含了各出生集团96%左右人口的首婚^[6]而言,我们发现由 R_F 所描述的首婚失衡从2020年起将在9%上下波动。这一比例对应于每年约100万“额外”未婚男性处于无初婚配偶状态。对于这些“额外”未婚男性,这种前景有可能改变吗?为结婚,他们将不得不从由初婚频率所描述的传统文化模式之外去寻找配偶,这涉及到初婚频率的变化。理论上,只要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是负增长人口,增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将有助于 R_F 的下降;另外,增大初婚频率的方差也将有助于 R_F 的下降。例如,当初婚频率变为均匀分布时 R_F 将变为 R_T 。但是,这些变化是对传统的首婚年龄和夫妇年龄差距偏好的改变,因而不可能是任意地大。为此,我们考查两种形式的首婚频率变化。一种是首婚夫妇年龄差距增大,由未婚男性推迟结婚实现,见图3曲线I,其中女性首婚频率If为1990年数值,而男性首婚频率Im在1990年基础上推迟两年。第二种是增大首婚频率方差,相当与扩大所有初婚者(而不是夫妇间)的结婚年龄差距,见图3曲线II,其方差为原始首婚频率的4倍。尽管这两种变化已是对传统的首婚年龄和夫妇年龄差距偏好的很大改变,因而并不是可以很容易实现的。但我们发现,即使如此首婚失衡状况仍不会有根本变化。对应于这两种变化的首婚失衡状况见图4曲线I与曲线II。图4中实线为原始假定下的首婚失衡状况。本质上说,在一定范围内改变首婚频率的分布而不改变其幅度或最大曾婚比(如96%),只能对首婚失衡的波动状况发生显著影响。因为波动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中的波动和首婚频率对其取样滤波造成的,扩大方差加强了滤波因而使波动减弱,增大年龄差距减弱了滤波因而波动增强。而均值,在我们所讨论的首婚频率分布的变化范围内是由“历史的”SRB决定的,它的下降只能由减少首婚频率的幅度产生,即9%的未婚男性退出由首婚频率描述的首婚

婚市场,或他们永不结婚,或他们的配偶为再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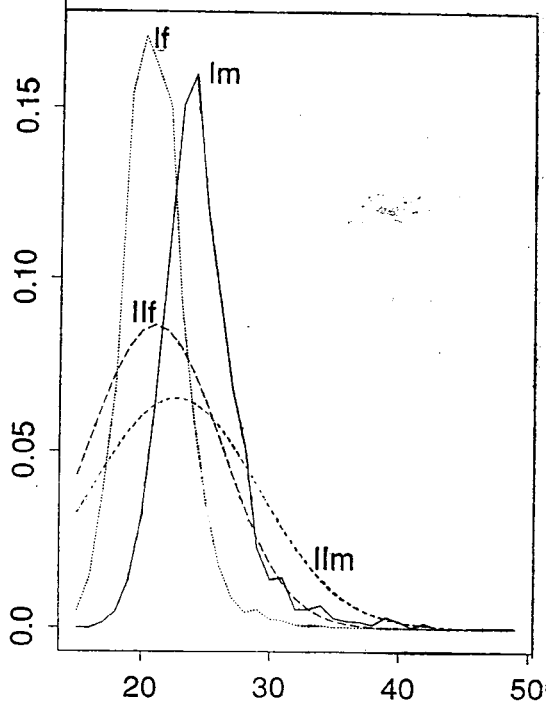


图3 初婚模式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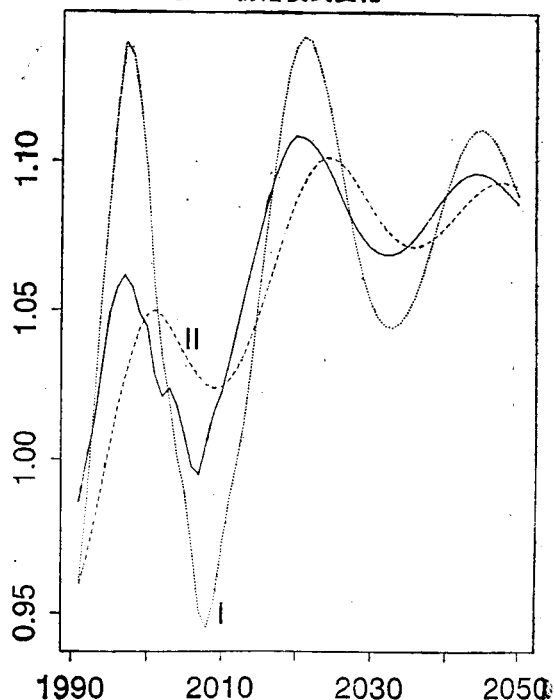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1990~2050年潜在初婚比(实线)

总婚姻市场的失衡小于初婚,但仍有“额外”男性(见图3中 R_T)。这与工业化

国家的情况相反。工业化国家女性期望寿命高出男性使得SRB高出105的“正常值”，导致了显著的“额外”女性。在中国，虽然成年死亡率的模式与工业化国家相似，但高SRB却扭转了这种趋势，导致了“额外”男性〔7〕。

二、有男孩概率

对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已有很多讨论〔8〕，它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倾向于成为驱使SRB上升的力量。男孩提供其父母的老年保障是产生生育中的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对夫妇微观的观点考察当前的高SRB是否对他们至少有一个男孩的概率有显著影响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使用1990年的胎次比和各胎次的SRB，得到一对夫妇至少有一个男孩的概率为0.674；如果使用同样的胎次比但各胎次的SRB均为105，则这一概率变为0.665。这种差别从一对夫妇的观点来看是太小了，很清楚，如果要使这一概率可观地上升而高胎次的比例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SRB将进一步上升到显著高于1990年的数值，这种上升是可以通过基于现代医学技术的选择性流产达到的。

三、无男孩负担比

较高的期望寿命和随之而来的老龄化使中国同许多国家一样对老年负担问题产生了关注〔9〕。一对夫妇会关心没有男孩的可能性，而一个社会或者政府则会对由无男孩老人带来的负担更为注意。政府的政策已通过在社会养老保障中对无男孩者给予特别关注，显然，这种政策降低夫妇想要男孩愿望的目标是明确的。因为无男孩老人数量是政府度量社会保障负担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讨论当前的高SRB较之历史的SRB使得无男孩老人比例有何种程度的下降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使用1990年的胎次比、生育率、死亡率和两种SRB的值，计算无男孩负担比NSDR。它定义为65岁以上无男孩人数比劳动年龄人数（见图5）。图5中实线为各胎次

SRB保持1990年数值情况，而虚线为各胎次SRB取105的情况。曲线的上升趋势是由近期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和较低的死亡率造成的。我们认为应当引起注意的不是这种显著的趋势，而是这两条曲线间的微小差别。这种微小差别说明，即使SRB高到1990年的水平，也没有对NSDR的下降产生显著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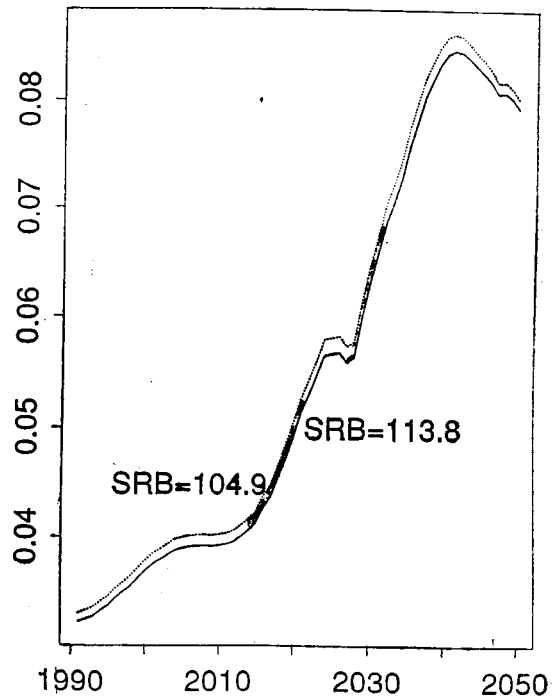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1990~2050年分胎次SRB与NSDR

总的老年负担比包括65岁以上所有人口，约为NSDR的3倍，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美国目前的老年负担比已高于我们对2050年中国情况的估计。

四、结论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某个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常常表现为负反馈形式，即阻止这方面或由此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本文所讨论的生育下降引起的SRB上升即是这样一种反应，其反馈的意义在于阻止无男孩概率的上升。从经验上看，这种反应的出现也许和生育下降的机制关系不大，或是说这种反应并不一定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因为韩国的生育下降和中国的机制很不相同,但却面临和中国基本相同的SRB上升局面(Y.Zeng等)。产生这种反应的表面现象是无男孩夫妇的老年保障,而根本原因却在于文化传统。因为即使在更替生育水平和SRB正常的情况下,平均一对夫妇也有一对异性晚辈保障老年,因而所谓无男孩养老的担忧实质上是无亲生男孩养老。再则,生育性别偏好并不仅仅和养老相联系。即使有这种根本原因存在,它也不是能够必然地发挥作用。因为如果简便的生前性别检验手段不是“碰巧地”与生育下降同时出现,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是否会出现由生育下降导致的SRB显著上升是值得怀疑的。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1990年SRB约114的值将会导致20多年后,约9%的男性无初婚对象的严重婚姻后果。而且这种后果是不能被婚姻模式分布的变化轻易地吸收的,加之经验已经表明这种变化会遇到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严重阻力[10]。

本文要强调的另一点是,引起SRB上升的反馈作用在1990年尚远未达到满意程度(即一对夫妇至少有一个男孩的概率达到生育下降前的水平),因而SRB的进一步上升将是非常可能的。无疑,不限制和消除这种反馈的根源和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它将因远未达到满意程度而进一步促使SRB上升,未来的婚姻后果将更加严重。

这种婚姻后果在2010年左右的情况已经不可改变,它是否会持续下去和变得更加严重取决于近期能否限制SRB的上升或使SRB下降。管制生前性别检验和为无男孩夫妇提供养老保障,可能部分地消除SRB上升的根源,而改变偏好男孩的生育文化和更广泛的歧视女性的文化传统才有助于完全彻底地消除SRB上升的根源。

参考文献

[1] A.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 A. Coale, F. Wang, N. E. Riley and F. D. Lin, Science 251, 389, (1991).

[2] A. Chahnazarian, Social Biology 35, 214.

[3] United Nations, Manual X, Indirect Techniques for Demographic Estima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83); S. Preston and M. Strong, in Consequences of Mortality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1986), 使用与本文相似的度量; R. Schoen, Demography 18, 201 (1981), and N. Goldman, C. Westoff, C. Hammerslough, Pop. Index 50, 5 (1984) 讨论了其他形式的度量。

[6] 《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10%汇总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北京。

[7] M. Lavelly and R. Freedman, Demography 27, 357 (1990); 彭玉,在联合国第27届人口大会上的发言,1994,3,纽约。

[8] J. Banister,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Y. Zeng, C. Zhang, S. Peng, Eds.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990.

[9] Y. Zeng, Popul. and Devel. Rev. 19, 283 (1993); S. Greenhalgh, C. Zhu, N. Li, Popul. and Devel. Rev. 20 (1994); J. L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4 annual meeting of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ay 5—7, Miami.

[10] J. A. Sweet and L. L. Bumpass, American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C. 2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1987).

(本文责任编辑 杨子慧)